



语言的轮休和充电

——第四轮语言哲学对话

赵摇俐摇等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前摇言

—

这是语言哲学的第四轮对话。前三轮对话分别是：《语言哲学对话》（于根元等著），由语文出版社 1993 年出版；《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于根元、夏中华、赵俐等著），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4 年出版；《语言以人为本——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赵俐等著），由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这一轮对话讨论的主要内容及见解有：

1999 年底至 2000 年初，不少语言学家敏感地提出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一场关于社会语言热点问题的大讨论或者说是大论战。大讨论的缘起，比较突出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的深入。讨论的焦点是语言规范。实质是关于语言观的大讨论。

大讨论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是我们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发展语言学术、锻炼语言学术队伍的大好时机。我们要接受“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上个世纪 80 年代大众语运动的两个教训：一是态度要好，尽量多团结人。二是要重在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要有实绩。要积极投入。这是中国语言学为世界做贡献的大好时机。

1999 套话，这里指不恰当地这儿套那儿套，而且只习惯于用这一套话，不怎么会用别的新鲜、通俗的说法，一张口就一大串，一套一套的，用得非常熟练，不怎么动脑筋，其交际值非常低。套话是



行尸走肉，是一种八股调，是思想僵化的产物。

说套话，是没有把你当成朋友。改变套话首先要改变关系；不说套话，说新鲜话，带来的还是协调人的关系。说套话，追根到底，可能是学习不够，创新不够，思想陈旧；不说套话，说新鲜话，带来的深刻变化还是人们重视创新和重视思想认识的更新。

獠我们常说的“生活化”，并不包括所有的生活现象，而是指生活的本质。人要认识生活，要深入生活，尤其是深入精神生活，还要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提高思维品质。每个人认识到的生活不同，只能接近生活本质。只有和社会结合，深入生活的本质，才是生活化。高于生活，不是脱离生活，而是更加深入生活。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偏离生活、偏离自然，所以要不断地回归生活和自然。

灏语言是开放的多层次多维的巨系统。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变化比较快的外层以及中间层组成，彼此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

语言的中介层有些比较耐磨，新颖度长期比较高，既稳定又新颖。语言外层进入内核之后，有的还会到外层来。语言内部的运动不是单向的。语言活跃的外层用多了，新颖度会磨损，新颖色彩逐渐潜藏，稳定色彩逐渐显现。有的语言不怎么用了，潜藏了，后来又用，又新颖了，不怎么用的情况我们叫它轮休、充电。有词语的轮休充电、某个义项的轮休充电和色彩的轮休充电。

轮休后是否可能再出来，这首先还是决定于社会交际的需要，这是一种新的需要，其次决定于它本身是否具备新的意义上、色彩上的功能。即在运动的时空点上，值得说和可以说结合了，条件才算具备。

纒体态语是从语言的低层次到高层次都有的表达手段。起初比较多的从人类学、社会学来研究。圆世纪愿年代后期，我们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用语言学的方法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我们现在的调查研究，有三点应该是进了一步的。一是新的体态语。有一些过去



也有过，现在显得突出了。二是进一步跟精神文明联系起来。三是使用动态比较的方法。

邈钱冠连先生的《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1994~~）是一本好书，很值得读。我们主张全息论，说一粒沙子看世界，我们不能都去研究沙子。语言反映全息更充分，我们还要研究语言。语言既然跟天地人全息，研究语言就要融于生活、融于自然、以人为本。天地人是运动的，语言是运动的，所以要注意天地人和语言运动的时空，注意人跟天地、语言的交接或者共振。我们研究全息，不只是把宇宙全息论反映到语言里来。不是掌握了全息论就是语言学家，还得搞语言。

邈关于方法和方法论两者有时候是相对而言的。方法和方法论是分层次的，方法里含有方法论，方法论后面还有它的方法论，有时候某个方法论也是方法。总体来说，方法论是处于基本理论和基本技巧之间的又分很多层次的。另外，本体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很难从有和无方面来区分，主要的区分是研究对象不同，有量、程度和类型的不同。

我们可以在讨论制约和发展方法、方法论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制约和发展方法、方法论的主要因素主要有研究目的，科技发展，认识论，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等，同一时期内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程度等。

好的方法论提倡的是科学的态度，是求真务实而不是华而不实，其他学科的发展给语言学贡献了大量的科学方法，如果语言学能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也将是对整个科学的巨大贡献。我们的方法会向混沌学、混沌的方法发展。混沌的方法就是纵横交错的、多向的、不整齐的、脉动的。脉动，每一个运动的部分都是脉动，每一个曲线里有小曲线。这种脉动又不是机械的运动，它是现象和条件的函数关系的运动，条件和现象的运动都是复杂的，条件也是分层次的。我们说应用语言学里还有队伍建设等，包括了机构建设、阵



地建设、课程设置、课题设置、学风和文风建设。这些方法也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

制约和促进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应该是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实践中来梳理。

☞手机短信形式上短，要精炼。一行一行显现，不能一下子看到末尾，可以制造悬念，抖包袱。写好了真不容易。它还是一种语言能力的开发和提高。那些难登大雅之堂，模式化的短信语言有待于提高。

短信语言属于语言的最外层，因此短信语言比较活跃，新颖度高，更新速度快，跟潮流更紧。短信佳作都大量使用了谐音、夸张、比喻、拟人、对偶、借代等修辞手法，反映了人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细致体察，体现出了知识性和人情味，富有幽默性和调侃意味。因此体现了不少人类交际的语言创新。

创作和发送短信，要重视交际对象。短信息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谁发，经常给谁发，发什么内容的短信，什么时候发，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创作者或发送者自己的生活品位，甚至生活态度。

☞2000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本身和引起的反响很有意义，可以说是世纪之交中国关于社会语言热点问题大讨论的又一个回合。这一个回合的特点，一是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有关负责人公开表态，二是反响总的是积极的，各界的人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水平提高了许多。

这本新的词典总的来说，从内容到形式给人新鲜感，体现了编者对新词新语研究的理论成果。比如，它的编写方式及内容体现出大汉语观、对语言动态本质的认识、对字母词的态度、以人为本的服务方式等等。有些方式并不完备，但它是一个思路的体现。收词量可以扩大一些，形式上可以再活跃一点。



词典的“典”，不是说收的每一个词本身在词汇系统里都是经典的，而是在一定的时空里收这样的词是应该的，有关的说明是典范的。收这样的词，体现了一种语言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词典都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评价，《新华新词语词典》事实上是承担了道德评价的。要研究的是什么叫道德评价，怎样承担。新词语的研究十年前就开始了，如今社会上的一些认识，有反复，可能因为又一批人成长起来了，也有认识的停滞和滑坡。

应用语言学的学风和文风问题是关系到一门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文风是学风的具体表现。应用语言学的学风和文风，既有与其他学科相同的共性，又有它自己的个性。共性方面，要实事求是。个性方面，应用语言学是交叉学科，有多学科的综合性。它不是广告语言、新词新语、法律语言等的拼合，而是探求其中共有的规律。所以，要多学科结合。本体语言学研究要强，应用研究要强，几个领域学科都要强。应用语言学还有队伍建设等方面。既然是交叉学科，就要向各学科学习，要谦虚，学习各学科的结晶。要注意哲学层面的贡献。文风，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能高高在上，板着脸。总的来说语言表达要好一点，要证明应用语言学的价值。注意可读性。涉及到语言交际、作家作品的，特别要有可读性。新词新语、广告语方面的特别要注意创新性。对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要熟悉。标点、字形的规范要熟。

应用语言学的学风和文风建设要注意一是思想方面，二是事实方面。应用语言学的文风要有思想附加值，又要有第一手材料。思想的附加值建立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同样有材料，我还有思想；都有思想，我又有材料。所谓分量，就是功力加上必要的劳动时间。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要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不为引证而引证，不为方法而方法。板着面孔可能是自大，也可能是自卑，可能是能力所限，也可能是环境所迫。朴素的文风、华丽的文风都是本事，就看你该用哪个。



我们研究的总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理论研究者的研究不能脱离实际，要“接地气”。

员鄞中外语言文化需要融合，可以融合。任何语言都有吸收能力，吸收不好，是人的因素。为什么有的阶段好，有的不好？要有相互平等、融合的气氛。为什么那么多韩国人学中文？因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快了，有东西可学。语言研究，要更多一些求同存异的发现眼光。

融合就不是排斥对立，是取长补短；融合又不是同化，不是单纯的输入输出，是相互渗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借鉴，包括接触、理解。融合是为了缩小对立。语言差异、民族差异永远有，有了好，其中就有个性，是不同的色彩、表现。弘扬民族文化，是发展个性。

员鄞上个世纪 怨园年代中期广告语言出现了为期不长的文学化倾向，近几年广告语言出现了哲理化倾向。有些商品用哲理化的语言介绍自己的特点、服务等，引发人们的联想和思考。

这个时候出现了广告语的哲理化倾向，原因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的竞争，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以及对理论的重视。广告人应该是商人 垣诗人 垣哲人，三者是结合的，但也是有个层次的。还有，哲理化倾向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文学方面。

哲理不能是说教、玄虚、假深沉、迂腐、酸溜溜，是讨论，是平等，是谦虚，是觉悟。而且要有很好的语言来表达。广告语的哲理化倾向，它还是广告语，不是哲学书。

那么多广告，有的不能用哲理化的语言，有的很难用。总的来说大概是观念性的、企业形象诉求方面的才好用一些。

员鄞中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发展的走向包括：一是应该怎么走，二是事实怎么走，三是趋向。

应该怎么走：纵横交错。我们要立足于本体，立足于一切分支学科，还要从宏观上梳理应用语言学的规律。还要吸收已有的理



论。当今外部条件比较好，重视应用研究、决策研究、跨学科研究。有了语用所和《语言文字应用》，这几个条件还在发展。这是我们应用语言学理论大有用武之地的時候。近十多年来，中国世纪之交的关于社会语言热点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澄清了一些基本认识。原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认为可能就是热闹热闹，一种认为可能带来理论上真正的繁荣。现在看来，取得后一个前途，心里比较踏实了。形成几个高层次的群体，进行高层次讨论，这些群体又有特点，与别的群体有共性，彼此交叉、共荣，这一点已经近乎成为事实了。与西方，以前谈差异多，吸取的同时排斥，不是心甘情愿地吸取，或者采用双重标准。现在比较注意对世界其他文化的尊重，融合、交流方面。那样学习更平和。新的领导班子，我们看到主要特点是务实。搞科学就怕泡沫、虚假。材料是真的，在真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比较可靠。假的会害人不浅。高层领导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好的形势。

中国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主要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我们的实际问题跟外国的有很多不同。我们的语言生活很丰富，很多实际情况调查研究不够，问题也复杂。如果各方面情况都很好，我们的研究也难，如果很差，研究也难，又有发展又有不足最好研究。努力针对中国实际情况，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从中寻求规律。这是中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发展最主要的走向。理论的检验看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语言生活是否丰富多彩，理论是否发展。

二

本轮对话从 1994 年 12 月 15 日开始到 1995 年 1 月 15 日结束。1994 年底结束上半轮，次年 1 月开始下半轮。基本是每周讨论一次。话题仍然主要是由于根元老师确定，我们这群学生偶有好的选题也申请讨论，于老师也欣然参加。比如关于手机短信息的题目，



就是由年轻学生提议的。参加对话的人员主要是于老师及其弟子和朋友。讨论的地点可以说是转战四方。我们借用过学校教学楼不同的教室，在于老师的办公室里也济济一堂过，后来讨论地点主要固定在我家。我家的地方不大，每次十几个人坐沙发、坐椅子，还有做小板凳的，但这不是冷板凳，一群人热热火火。最豪华的讨论环境当属商务印书馆的新楼了。圆四零年过完农历新年，我们在学术地位高、经济效益好、建筑装修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喝着热茶，讨论着新词新语，会着老朋友新朋友，不亦乐乎。

原本计划在圆四零年的远月拿出这轮对话的书稿，下半年出版的，后来改变计划的原因是考虑到两位对话参加者有两篇关于我们讨论论题的文章要单独发表，所以等待文章先发表后再出版对话内容。一位是湖洲师院的苏向红老师，在参加圆四零年猿月员日的“汉语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进一步面向世界”这次对话之前，她就在构思有关论文，参加对话后，又有了新的思路，修改撰写成了同名单篇论文，现在已经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圆四零年第源期上。一位是刘艳春，原本她就研究过广告语言，在圆四零年猿月缘日讨论完“关于广告用语的哲理化倾向”之后，对这个论题颇感兴趣，有了进一步撰写论文的冲动。后来写成论文《广告语言的哲理化倾向》，现在已经发表在《江汉大学学报》圆四零年第猿期上。

我在圆四零年远月于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识》，是在四轮对话的基础上写成的，于老师称之为四轮对话的“精选、重组和发展”（见该书序）。原本《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识》应该是在这轮对话之后问世的，但终因这轮对话的书稿推迟出版而先与读者见面了。虽然，这轮对话中的一些内容在《语言宣言——我们关于语言的认识》中已经提及，但这里呈现的毕竟是对话的原貌，来龙去脉更详细一些。对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的材料和思路。



三

世纪之交，各个领域、各门学科都在做总结，在展望，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从 1995 年 4 月 1 日第一轮语言哲学对话有了开场白之后，到 2005 年 3 月 1 日本轮对话的最后一次讨论，历时 10 年，参加对话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前辈同仁们共达 100 位。这 100 位同行因为对本学科的关注坐到了一起，交流对学科的实际和理论的认识。讨论的内容有关于语言学理论的语言的交际性、工具性、人文性、动态性、全息、运动方式、语言能力及语言创新等问题，有关注语言工作的进进退退、语言规划、文风及学风、中外语言文化的融合、理论发展走向等问题，还有大量的从语言生活实际中发现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论题，比如外来语、新词新语、十字街头语言、网络语言、新体态语等等。

有些问题的讨论在几轮对话中具有明显的发展。比如关于语言的结构和运动，在第一轮对话的“动态：语言的本质”、第二轮对话的“语言的潜与显”、第三轮对话的“语言使用的保护”的基础上，于本轮对话中进一步探讨了语言运动的方向，提出了语言的轮休、充电，这才较清楚地提出了“内核外层互补说”。本轮对话的关于“若干新体态语调查研究”的讨论在第二轮对话中也有相关的关于“止语”的讨论。还有於春在本轮对话的第十一次讨论中所说的：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在我们的对话中始终贯穿着。第一轮语言哲学对话中于老师、李宇明、邢福义、萧国政他们在谈怎样发展我国语言学的时候，涉及了“关于浮躁”“思想方法——有待调整的几个方面”“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等问题；《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中，讨论了所谓“纯洁语言”；《语言以人为本——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中，讨论了毛泽东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回顾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这轮对话前期，我们就套话问题进行了讨论。



虽然这四次对话没有明确以学风和文风为题，但是可以说学风和文风的建设在历次的对话里一脉相承。关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也一路进展，由第二轮对话的“关于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到第四轮的“制约和促进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刘艳春的博士论文正是相关论题。于根元老师的专著《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已经于 2014 年 10 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在交流、碰撞之中，理论建设在逐步进展，也推动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和实际生活。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教材和论文中不时出现的我们讨论的影子。如果没有这些讨论，《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4 年）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一轮一轮的对话，还磨练了我们的队伍。这是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对话者之间相互启发，讨论之后，很多人又有了新的收获，成就了一篇篇论文和一部部书稿。前面提到了关于新词语和广告语的论文。还有於春在讨论完第三轮对话的“毛泽东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后，写成《克服形式主义党八股，改革会议新闻报道》一文发表在 2014 年 10 月的《广播与电视》上。第三轮对话中的“播音主持不规范语言现象”为陈茜的硕士论文《播音主持不规范语言现象研究》奠定了一部分基础。“关于‘语结’”发展成为於春的硕士论文《论语结》。“关于‘程序语言’”的讨论发展成为陈晓宁的硕士论文《论整体设计语言》。后两篇硕士论文即将发展成为专著。第三轮中的“十字街头的语言文字”已经发展成陈晓宁的同名专著于 2014 年 11 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本轮对话中的“若干新体态语调查研究”一题，已经由熊征宇完成硕士论文，相关专著近期完成；“手机短信息”的讨论孕育出了《你的手机来信了——大学生原创短信息》一书，由贾磊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出版。这次有关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的讨论，于根元老师发展之后写成《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在《长江学术》2014 年的总第



远辑上发表。

学术交流的内容和深度不同了，讨论的形式也应该发展。所以，我们这样的语言哲学对话已经告一段落。关于新的讨论形式，我们正在尝试人数少一些的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成果之一希望是若干专题论文。新的形式也是语言哲学对话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一起，讨论学术，交流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气氛，出方法，做着我们认为该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队伍建设、理论建设。当历史回顾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感受到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影响。

赵摇俐

二〇〇〇年 苑月 圆日



目摇录

前言	
员	世纪之交中国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
圆	论套话
猿	深入生活，才能高于生活
源	语言的轮休和充电
缘	若干新业态语调查研究
远	关于语言全息
苑	制约和促进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和 摇方法论发展的主要因素
愿	关于手机短信息
怨	汉语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进一步面向世界
员	应用语言学的学风和文风建设
员	中外语言文化融合的条件和空间
员	关于广告用语的哲理化倾向
员	中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发展的走向

后记



世纪之交中国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

圆园园年 员园月 员缘日

赵摇俐：圆园园年 源月初我参加博士生招生复试的时候，于老师就问了我关于这次论战的问题。后来，看到网上关于网络语言、外来语等语言问题的争论，我有些感觉到了。

于根元：圆园园年底到 圆园园年初，好几个语言学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一点。圆园园年初商务印书馆召开的一次新年茶话会上，我说了这个意思，陈章太、李行健都从不同的角度说了这个意思。圆园园年 员园月出版的《网络语言概说》“前言”里，我说：“近几个月来，不少语言学家敏感地提出我们面临着一场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或者说是大论战。”

大讨论的缘起，比较突出的是 圆园世纪 怨年代初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的深入。那个时候，不少语言学界之外的上层人士有意见。一是说一些词不文明，例如“泡妞”。二是说不懂了。三是说不对，例如认为“政策倾斜”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一些搞语言学的人也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为起初不能认为是规范的。二是要等等看，看



优胜劣汰。相关的有追认说。三是认为语言发展不能靠流行语。相关的有新词新语流星说、风说、昙花说。四是认为语言越稳定的越规范，越稳定越是语言的上品。五是认为一个意思有一个词就可以了，例如有了“出租汽车”为什么还要有“的士”，有了“再见”为什么还要有“拜拜”。

讨论的焦点有几个。一是什么是规范。我们提出语言规范的衡量标准是交际值，是交际到位的程度，还提出交际度。我们还不同意追认观，理由是新的语言一开始都是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的，不能都认为是不规范的，用的时间长用的人多的也有不规范的，追认观服务不及时，有的词语搞不清时间长短，有的词语我们不希望时间长。我们提出预测观，~~1995年~~占了上风。~~1995年~~正式改为前瞻跟踪观。~~1995年~~在澳门会议上提出语言由两部分组成，而且跟语言规划、跟人联系起来。《网络语言概说》里说了内核外层互补说的文化的根据。

第二个是关于语言的色彩。我们提出新颖理论，提出新颖度。进一步提出什么是语言交际能力，我们认为语言交际能力是同多方面的人实际交际既趋同又趋新不断调整好度的能力。我们认为新颖度是语言创造的标志和衡量标准。由此还发展了语言潜显理论。

我们在收集新词语的时候发现，语言创新跟不规范是共生的。加上中介说，我们进一步认为纯洁语言的说法是不对的。~~1995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许嘉璐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理由是：一是人不纯，二是学习是个过程，三是新的语言现象出来以后又要学习，四是不规范的现象是不断新生的，五是谁来纯洁，六是不纯洁是语言新陈代谢的正常情况。规范是为了提高语言生活的质量，包括语言创新，而不是为了语言纯洁。

此后的大讨论涉及了广告语言和外来词语。

广告词语主要是成语谐音改字。说是误导学生，破坏语言规范和纯洁。有人主张封杀、有人谩骂。



外来词语的讨论声势很大，主要说是洋化、殖民化。

赵摇俐：回顾一下历史上关于语言问题讨论有过不同的方式：

有以运动的方式来倡导语言新观念的，像“五四”前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以及清末到 1919 年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从文学界开始，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一个重要部分。有历史贡献，但也有其不足。最大的遗憾是理论探讨不深入。20 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也和别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但火药味不那么浓，所以讨论更活跃。国语运动比较成功，原因在于一是发挥了一批权威学者包括语言学家的作用，二是与此相结合，发挥了行政的作用。（参看于根元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第一编，书海出版社，1997 年）看来，运动激烈的，语言问题讨论不太深入；语文工作不和重要的、叫得响的事情挂钩，又不好实行。介乎其间的比较好，学术讨论容易活跃和深入，工作又容易实行。这次世纪之交的讨论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有语言研究者主动用文章形式发起讨论的，比如《语言文字应用》杂志从 1995 年开始连续三年刊登了关于语言观的讨论文章，讨论也很深入。

再就是学术界的实际研究引发的社会上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比如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新词新语冲击波和 2000 年《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编撰所带来的网络语言冲击波。最后还有语言生活实际中的新现象带来的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见，近来网上关于社会语言，尤其是网络语言和外来词的讨论就是这样的大讨论。这都是世纪之交中国关于语言问题大讨论的一部分。参加的人多了，讨论的介质也多了。

这些讨论具有共同的背景，这就是语言生活实际发生变化了，研究者行动了，环境宽松，人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了，关注语言的人多了。因此，讨论是好事。讨论说明有理论问题没有廓清，有思想方法的问题需要梳理。大讨论是大发展的契机。当然，讨论，难